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3.02.006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资源空间格局优化

——省域单中心与多中心的比较

徐悦[✉], 张桥云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在新发展阶段,积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并导致中心城市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强。运用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地”模型分析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形成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城市间距离的增加和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这种虹吸效应。选取 12 个单中心省域和 6 个双(多)中心省域,以 2006—2019 年为样本期间的分析发现: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大而减弱;在双(多)中心省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竞争)弱化了单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上述影响在地级市层面和县级市层面、对于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均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目前,多数省域的金融中心建设采取单中心模式,少数采取多中心模式。有条件的省域应适时采取多中心模式或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同时也要重视和激励外围城市的金融发展及其从业人员效用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心;中小银行分支机构;“中心地”模型;虹吸效应;金融集聚

中图分类号:F061.5;F832;F1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3)02-0079-17

引用格式:徐悦,张桥云.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资源空间格局优化——省域单中心与多中心的比较[J].西部论坛,2023,33(2):79-95.

XU Yue, ZHANG Qiao-yu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comparison between aingle-center and multi-center in provincial areas[J]. West Forum, 2023, 33(2):79-95.

* 收稿日期:2022-12-26;修回日期:2023-02-20

作者简介:徐悦(1985),通信作者,女,四川威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金融、金融地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E-mail:503858278@qq.com。张桥云(1963),男,四川宜宾人;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银行产品设计、存款保险、金融服务外包研究。

一、引言

目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各种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心城市的布局与发展将对资源和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并具有资源配置功能,是引导要素流通的关键性因素,因而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尤为突出。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历来重视金融工作,积极营造金融发展区位优势,发展本地金融乃至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一直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洪正等,2017)^[1]。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无疑会加速本地区金融资源的自然集聚过程(孙国茂等,2013)^[2],避免金融产业整体的低水平平均齐化发展(俞颖等,2017)^[3],降低本地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的耗散(谢漾等,2022)^[4],进而增强区域的整体金融竞争力。然而,金融资源向金融中心的集聚可能对非中心城市的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金融资源的过度集聚也会阻碍金融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因而,有必要从整体发展的角度探讨怎样的区域金融中心布局是最有效率的。

虽然,随着区域金融中心规模和层级的不断提升,其资金配置效率提高对中心及其外围地区的实体经济效率提升是有利的(江艇等,2018)^[5],但区域金融中心输出的金融服务更多的是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达到一定年龄的企业生产效率(Klagge et al, 2005;陶锋等,2017)^[6-7],而依赖于“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的中小企业则更亲近与其规模相对应且地理邻近的中小金融机构(Stein, 2002; Degryse et al, 2005; 林毅夫等, 2005; Papi et al, 2015)^[8-11]。2021年,银保监会在《关于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强调,地方性法人银行应“把握‘地缘、亲缘、人缘’的软信息优势,完善网点布局”,可见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布局的角度来探究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积极功效与负面影响,进而为更好发挥区域金融中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行稳致远等作用提供政策启示。

国外关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网络理论。一方面,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两区域模型(Krugman, 1991)以及Fujita等(1999)、Tabuchi和Thisse(2011)的“中心地”模型^[12-14],采用规范的方法刻画了在集聚与分散两种力量作用下产业空间结构演变的动态均衡过程。另一方面, Martin(1999)和Sassen(2005)等对城市体系中要素流空间网络关系的研究^[15-16],突出了信息化时代金融中心城市作为资本运动门户和关键节点的作用,也引发了Klagge等(2005)、Karen等(2020)对通过地方金融市场解决非中心地区“融资缺口”(financial gap)问题的关注^{[6][17]}。Wójcik和Macdonald-Korth(2015)的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原本中心化的英美金融体系更加向中心区域集中,而地方金融市场支撑下的德国金融体系结构稳定^[18]; Sokol和Pataccini(2020)的研究则显示,在新冠肺炎流行时期地理尺度上的金融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19]。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金融空间集聚的探讨,包括金融集聚的成因(车欣薇等,2012;王如玉等,2019;徐悦等,2021)^[20-22]、金融中心的评价(倪鹏飞,2004;胡迪苏,2018)^[23-24]、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等(李林等,2011;陶锋等,2017)^{[25][7]}。而关于我国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布局的研究相对较少, Yeung等(2012)、贺灿飞和刘浩(2013)研究了国有大型银行机构改革后的网点分布趋势^[26-27], He等(2008, 2009, 2011)研究了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选址变化^[28-30],王擎等(2012)、李广子(2013)、李梦雨和魏熙晔(2016)对中小银行的跨区域经营进行了探讨^[31-33],庄希勤和蔡卫星(2021)研究了银行“离乡进城”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改变^[34]。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缺乏

相关经验证据;此外,也需要关注和加强对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布局的研究。从我国的省域经济发展来看,作为一个地理范围较大的行政区划空间,设立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各地也在积极推进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而且有的省域还形成了多个区域金融中心。有鉴于此,本文从中小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角度探究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具体来讲:首先,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模型(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of Central Places),分单中心和双中心两种情形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然后,构建单中心和双中心计量模型,利用2006—2019年12个单中心省域和6个双(多)中心省域的数据,实证检验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影响。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将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模型应用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背景下的金融从业者效用分析,并探讨单中心与双中心布局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差异化影响;二是采用地(县)级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影响,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金融资源配置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形成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这种虹吸效应。该结论有助于科学认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并为各地区在积极推进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避免金融发展的空间结构出现“外围塌陷”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对“中心地”模型的拓展

1. “中心地”模型

保罗·克鲁格曼最早通过将市场间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纳入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产业分布存在“中心—外围”两区域稳定均衡状态的可能(Krugman, 1991)^[12]。Tabuchi和Thisse(2011)在克鲁格曼的两区域模型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交易成本差异提出了产业多层次集聚的“中心地”模型^[14],王如玉等(2019)将“中心地”模型进一步用于金融集聚下的金融空间结构研究^[21]。该模型假设:城市体系分布在长度为1的环型轨道上,一个城市为环形轨道上的一个点(x_c),有 C (大于等于2)个城市;经济体系中包含生产差异化产品、具有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的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以及生产同质化商品、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农业部门;金融部门有 I 个行业,为制造业部门提供资金,也为居民提供差异化金融产品;制造业部门有 J 个行业,生产过程中除使用劳动力外还需使用资本;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人力资源在城市和行业间可自由流动,并通过集聚形成产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农业部门与其他两部门的人力资本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自由流动并均匀分布在 $x \in (0, 1]$ 的环形体系中。该模型假设与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银行业市场结构情况基本相符。

由于非农行业间和城市间的从业者可自由流动,因而从业者会尽可能地寻找效用最大化的行业和工作地点,并通过竞争达到行业 and 地理集中度的均衡。为考察不同区位条件下劳动者的效用差异,“中心地”模型采用间接效用函数来表示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并通过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适当简化模型常数项,将劳动者间接效用函数 $V(x)$ 表示为随区位 $x \in (0, 1]$ 变化的函数。借鉴Tabuchi和Thisse(2011)、王如玉等(2019)的研究^{[14][21]},在“中心地”模型的基础上分离出金融业,则城市 c 金融行业 i 的从业者间接效用函数如式(1)所示:

$$V^i(x_c) = \sum_{i=1}^I \frac{\alpha^i}{\alpha^i - 1} \ln \left[\sum_{d=1}^C \lambda_d^i \varphi^i(x_c, x_d) \right] + \sum_{j=1}^J \frac{\alpha^j}{\alpha^j - 1} \ln \left[\sum_{d=1}^C \lambda_d^j \varphi^j(x_c, x_d) \right] + w(x_c^i) \quad (1)$$

其中,参数的上标表示行业,下标表示城市(位置)。以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例(第二项为制造业):参数 α^i 表示消费者对金融行业*i*的产品偏好, λ_d^i 表示城市*d*金融行业*i*的从业人数, $\varphi^i(x_c, x_d)$ 表示城市*c*、*d*间金融行业*i*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可得性或生产者服务能力^①。式中第一项和第二项由间接效应函数的价格指数简化而来,其结果反映了居住在城市*c*的金融行业*i*的劳动者通过获得城市体系中的所有金融部门和所有制造业部门的各类商品和服务所能实现的效用。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有理由相信,随着某地消费者服务和产品可得性的提升,劳动者效用 $V^i(x_c)$ 将提升,进而促进城市*c*行业*i*的集聚和发展。式(1)第三项为城市*c*金融行业*i*从业者的工资收入^②,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均衡结果如式(2)所示:

$$w(x_c^i) = \frac{\alpha^i}{\sigma^i} \left\{ \sum_{e=1}^c \frac{\Lambda_e^i \varphi^i(x_c, x_e)}{\sum_{d=1}^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e)} + \sum_{e=1}^c \frac{\Lambda_e^j \varphi^i(x_c, x_e)}{\sum_{d=1}^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e)} + \int_0^1 \frac{(1-r)(1-u)\varphi^i(x_c, x_a)}{\sum_{d=1}^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a)} dx_a \right\} \quad (2)$$

其中,大括号内第一、二、三项分别表示城市*c*金融行业*i*从业者分别为城市体系中金融业人口、制造业人口、农业人口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可以看到,从业者收入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若某一行业从业者有具体的产业偏好,则其收入也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从业者收入也取决于其相对服务能力,若 $\varphi^i(x_c, x_e)$ 大于 $\varphi^i(x_d, x_e)$,城市*c*金融行业*i*从业者对城市*e*的服务能力强于城市*d*,则城市*c*金融行业*i*从业者的收入和效用更高。式(2)也体现了“中心地”模型对空间中产业集聚与分散两种力量的刻画,以式(2)第一项为例:从分子部分看,如果城市集聚的人口越多,意味着市场越大,从业者收入和效用越高,产业空间集聚力越强;从分母部分看,如果同行业从业者在某一城市集聚越多,则该地的同行竞争越激烈,劳动者收入降低,效用越小,产业空间分散力越强;产业空间结构在集聚与分散两种力量作用下形成空间均衡,由于非农人力资源能够在城市和非农部门间自由流动,均衡状态时各部门的劳动者效用差异为零。

2.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发展

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地区产业结构均衡将通过自然状态下的技术进步打破。例如,城市*c*金融行业*i*生产者服务能力 φ_c^i 上升,则其从业者收入水平和效用水平更高,从而引起其他城市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向城市*c*金融行业*i*集聚。劳动者区位选择的变化引起产业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改变,低效率行业从业者向高效率行业转移则形成产业结构升级。而政府引导模式下的金融中心建设,则会通过政府推动和金融制度改善加快金融产业空间结构的自然变化过程(孙国茂等,2013)^[2]。地方政府在降低金融机构置业成本、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生活质量、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改善监管环境、提供政策优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能动性(潘英丽,2003)^[35],这些措施一方面可以提升从业者消费可得性,另一方面则通过降低行业成本、增加收入等提升从业者效用水平。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金融业具有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控管理人员和促进交易等中介功能(King et al, 1993)^[36],能够进一步提升其他产业的效率(陶锋等,2017)^[7],进而提升中心城市劳动者的整体效用水平。因此,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借助政策引

① $\varphi^i(x_c, x_d)$ 是距离 $|x_c - x_d|$ 、运输成本 τ 、边际生产成本 m 及产品替代弹性 σ ($\sigma > 1$)的函数,有: $\varphi^i(x_c, x_d) = \tau(x_c, x_d)^{1-\sigma^i}$, $\tau^i(x_c, x_d) = m^i (\tau^i)^{\min\{|x_c - x_d|, 1 - |x_c - x_d|\}}$,该表达式意味着随着城市距离的缩短和成本的下降,消费可得性上升,从业者效用提高。

② 由于制造业部门从业者工资 $w(x_c^j)$ 非本文考察重点,此处仅列示金融行业从业者工资表达式,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相关研究的模型。

导、改革先行带来的初始优势,最终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张杰,1994;孙国茂等,2013)^{[37][2]}。本文重点考察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空间结构的影响。由于从业者效用取决于其相对服务能力,这里近似认为外围城市的金融服务能力相当,中心城市的金融服务能力相当;同时考虑到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可能存在多个金融中心,分别采用简化的单中心模型(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和一个外围城市)和双中心模型(有两个中心城市和一个外围城市)进行分析。

(1)单中心情形

假设城市A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C为外围城市,均衡状态下,从业者原效用水平相当,城市A金融行业*i*从业者的效用函数如式(3)所示:

$$V^i(x_a) = C_a^H + \frac{\alpha^i}{\sigma^i} \left[\frac{\Lambda_a^H \varphi^i(x_a, x_a)}{\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a)} + \frac{\Lambda_c^H \varphi^i(x_a, x_c)}{\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c)} \right] \quad (3)$$

其中, C_a^H 表示式(1)的第一项和第二项(金融业*I*和制造业*J*简化表示为*H*),中括号里第一项表示城市A金融行业*i*从业者为城市A劳动者服务获得的效用,第二项表示其为城市C劳动者服务获得的效用。同理有,城市C金融行业*i*从业者的效用函数如式(4)所示:

$$V^i(x_c) = C_c^H + \frac{\alpha^i}{\sigma^i} \left[\frac{\Lambda_a^H \varphi^i(x_c, x_a)}{\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a)} + \frac{\Lambda_c^H \varphi^i(x_c, x_c)}{\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c)} \right] \quad (4)$$

原有均衡状态时, $V^i(x_a) = V^i(x_c)$ 。城市A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后,金融功能、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集聚将产生多方面的正外部性,例如,金融中心有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与交易便利、信息网络与知识共享、专业人才池效应及声誉优势等。城市A的金融资源集聚将为其金融从业者带来 k^i 倍于其单位工资的利润,则城市A金融行业*i*从业者的效用函数如式(5)所示:

$$V^i(x_{ak}) = C_a^H + \frac{\alpha^i}{(1-k^i/f^i) \cdot \sigma^i} \left[\frac{\Lambda_a^H \varphi^i(x_a, x_a)}{\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a)} + \frac{\Lambda_c^H \varphi^i(x_a, x_c)}{\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c)} \right] \quad (5)$$

其中, f^i 为生产单位产品或服务需要的劳动力。由于 $\frac{1}{(1-k^i/f^i)}$ 倍收入系数的增加,区域金融中心城市A的金融产业*i*较外围城市C和其他产业变得更有吸引力, $V^i(x_{ak}) > V^i(x_c)$,这将导致外围城市C的金融资源向中心城市A集聚,而有金融资源和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在外围城市C的布局。

由此提出假说H1: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使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则对中小银行在外围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具有负向影响。

模型中外围城市只有一个,但现实中必定有多个外围城市,而不同的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不同,距离不同导致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等的不同则会形成不同强度的虹吸效应。外围城市C的从业者迁移工作地点(到中心城市A工作)后的效用函数如式(6)所示:

$$V^i(x_{ac}) = C_c^H + \frac{\alpha^i}{(1-k^i/f^i) \cdot \sigma^i} \left[\frac{\Lambda_a^H \varphi^i(x_a, x_a)}{\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a)} + \frac{\Lambda_c^H \varphi^i(x_a, x_c)}{\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c)} \right] \quad (6)$$

其效用变化如式(7)所示:

$$\Delta V^i(x_{ac}) = V^i(x_{ac}) - V^i(x_c) = \frac{\alpha^i}{\sigma^i} \frac{\Lambda_a^H}{\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a)} \left[\frac{1}{(1-k^i/f^i)} \varphi^i(x_a, x_a) - \varphi^i(x_c, x_a) \right] + \frac{\alpha^i}{\sigma^i} \frac{\Lambda_c^H}{\sum_{d=a,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c)} \left[\frac{1}{(1-k^i/f^i)} \varphi^i(x_a, x_c) - \varphi^i(x_c, x_c) \right] \quad (7)$$

其中,第一项表示从业者从中心城市 A 市场中获得的效用增量,取决于 $T_1 = \frac{1}{(1-k^i/f^i)}\varphi^i(x_a, x_a) - \varphi^i(x_c, x_a)$ 的变化;第二项表示从业者从外围城市 C 市场中获得的效用增量,取决于 $T_2 = \frac{1}{(1-k^i/f^i)}\varphi^i(x_a, x_c) - \varphi^i(x_c, x_c)$ 的变化。由于金融服务,尤其是小微金融服务依赖于“软信息”的处理,本地社会网络更利于小微金融服务的发生(姚铮等,2013)^[38],而远距离传输会产生信息的失真失效,故有: $\varphi^i(x_a, x_a) > \varphi^i(x_c, x_a)$ 、 $\varphi^i(x_c, x_c) > \varphi^i(x_a, x_c)$ 。

为便于讨论,将 T_1 表达式转化为 $\Gamma_1 = \frac{1}{(1-k^i/f^i)}\varphi^i(x_a, x_a)/\varphi^i(x_c, x_a)$, 因有 $\varphi^i(x_c, x_a) = \tau(x_c, x_a)^{1-\sigma^i}$, $\tau^i(x_c, x_a) = m^i(\tau^i)^{\min\{|x_c-x_a|, 1-|x_c-x_a|\}}$, 用 $L = \min\{|x_c-x_a|, 1-|x_c-x_a|\}$ 表示两城市间最短距离,故有 $\Gamma_1 = \frac{(\tau^i)^{L(\sigma^i-1)}}{(1-k^i/f^i)} > 1$, $T_1 > 0$ 。类似地,将 T_2 表达式转化为 $\Gamma_2 = \frac{1}{(1-k^i/f^i)}\varphi^i(x_a, x_c)/\varphi^i(x_c, x_c) = \frac{1}{(1-k^i/f^i)(\tau^i)^{L(\sigma^i-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Γ_2 是否大于 1 却取决于城市间距离 L 与系数 k^i 的相对关系。城市间距离近,则 L 小, $\Gamma_2 > 1$, 此时 $T_1 > 0, T_2 > 0, \Delta V^i(x_{c \rightarrow a}) > 0$; 城市间距离远,则 L 大, $\Gamma_2 < 1$, 此时 $T_1 > 0, T_2 \leq 0, \Delta V^i(x_{c \rightarrow a})$ 可能为正,但逐渐变小,直至为 0(或负)。因此,随着外围城市 C 与中心城市 A 的距离增大,外围城市 C 的金融从业者迁移带来的效用增量减小。

由此提出假说 $H2$: 区域金融中心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随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即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随着两者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2) 双中心情形

在简化后的双中心城市体系中,除城市 A 是区域金融中心外,城市 B 为该区域另一个金融(副)中心,城市 C 为外围城市,这里,主要分析另一区域金融中心(城市 B)的建设是否对中心城市 A 对外围城市 C 的虹吸效应产生影响。首先,由于 A, B 两城都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势,两者之间不会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以城市 B 的金融从业者迁移到城市 A 为例,其效用变化如式(8)所示:

$$\Delta V^i(x_{ab}) = \frac{\alpha^i}{(1-k^i/f^i)\sigma^i} \sum_{e=a,b,c} \frac{\Lambda_e^H [\varphi^i(x_a, x_e) - \varphi^i(x_b, x_e)]}{\sum_{d=a,b,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e)} \quad (8)$$

此时,金融从业者脱离了原城市 B 的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上升,服务能力下降,则有 $\varphi^i(x_a, x_e) - \varphi^i(x_b, x_e) < 0$, 迁移意味着收入和效用水平降低。因而,对于城市 B 的金融从业者来讲,没有足够的动机迁移至城市 A 。而对于外围城市 C 的金融从业者来讲,迁移到中心城市 A 工作的效用变化会在式(5)的基础上减少对 B 城市服务的收入所得,如式(9)所示:

$$\Delta V^i(x_{ac}) = \frac{\alpha^i}{\sigma^i} \sum_{e=a,c} \frac{\Lambda_e^H \left[\frac{1}{(1-k^i/f^i)}\varphi^i(x_a, x_e) - \varphi^i(x_c, x_e) \right]}{\sum_{d=a,b,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e)} - \frac{\alpha^i}{\sigma^i} \frac{\Lambda_b^H \varphi^i(x_c, x_b)}{\sum_{d=a,b,c} \lambda_d^i \varphi^i(x_d, x_b)} \quad (9)$$

由于这种顾此失彼损失的存在, $\Delta V^i(x_{a,c})$ 减小,进而降低城市 C 金融从业者迁移至城市 A 的意愿。因此,另一区域金融(副)中心的建设将削弱原有区域金融中心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可见,相对于单中心布局来讲,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中心—外围”的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格局,进而有利于区域整体的金融发展均衡化。

由此提出假说 H3:在多中心区域中,一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弱化其他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进而弱化其他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基于我国的空间经济结构,本文以省域边界作为区域金融中心辐射影响的地理空间边界,建立控制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单中心模型和双中心模型,分别对只有一个金融中心和有两个及以上金融中心的省域进行分析。单中心模型如式(10)所示:

$$Bsm_{i,t} = \alpha_0 + \alpha_1 Fs1_{j,t} + \beta covars_{i,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其中,下标 i 代表外围城市, j 代表城市 i 所在省域的金融中心城市, t 代表年份, δ_i 代表个体(城市)固定效应, μ_t 代表时间(年度)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Bsm)为“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加”(个),反映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增设情况。采用地级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年新增数量来衡量,具体为样本城市辖区内当年新批准成立、持有金融经营许可证、具有开展金融业务一般资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数量^①。2006年放开中小银行异地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后,各地的中小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均有增加,但不同地区的增长速度差异较大。

核心解释变量($Fs1$)为“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反映区域金融中心(省会或首府)的金融发展和集聚水平。借鉴陶锋等(2017)的方法^[7],采用金融活动的地理密度来衡量,具体测度方法为: $Fs1_{j,t} = Fin1_{j,t} / S_{j,t}$ 。其中, $Fin1$ 为中心城市的金融活动规模,采用全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来衡量; S 为中心城市的地理面积,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衡量。

根据理论分析和既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covars$):一是“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亿元)来衡量;二是“人口规模”,采用年末户籍人口总数(万人)来衡量;三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千个),来源于相应的统计年鉴;四是“第三产业占比”,采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五是“经济开放度”,采用经平均汇率调整后的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六是“城市道路密度”;采用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万平方米)与行政区域面积(平方公里)的比值来衡量。

为检验研究假说 H2,在单中心模型中加入城市间距离的调节变量,建立如式(11)所示的调节效应模型:

$$Bsm_{i,t} = \alpha_0 + \alpha_1 Fs1_{j,t} + \alpha_2 Distance \times Fs1_{j,t} + \beta covars_{i,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其中,调节变量($Distance$)为“城市距离”,采用2015年样本城市与本省域金融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百公里)来衡量。

双中心模型在单中心模型中加入变量($Fs2$)“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②以及“省会中心金融集聚”与

^① 根据银保监会的相关管理规定,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其所在城市只按照分行和支行两个层次设立分支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实行总、分、支三级管理体制,中小银行设立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属于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自助银行+人”的咨询型网点界定为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实行持牌经营)。

^②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测算方法与“省会中心金融集聚”一样;由于在多中心省份中,江苏和浙江除省会中心外,各有苏州、无锡和宁波、温州两个非省会中心,选取金融规模较大的苏州和宁波作为非省会中心,金融规模较小的无锡和温州则视为外围城市。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交乘项($Fs1 \times Fs2$),用以检验假说 H3,如式(12)所示:

$$Bsm_{i,t} = \alpha_0 + \alpha_1 Fs1_{j,t} + \alpha_2 Fs2_{j,t} + \alpha_3 Fs1_{j,t} \times Fs2_{j,t} + \beta covars_{i,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2)$$

2. 样本选择 and 数据处理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以 2007 年 GDP 在 1 4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基础,追踪报告了 31 个金融中心城市在建设情况,我国几乎所有重大的金融改革创新都发生在这 31 个金融中心。由于统计口径差异或统计数据缺失,本文未将四个直辖市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市纳入研究样本,其余 26 个金融中心的省域布局如表 1 所示,其中 12 个省份为单中心省域,6 个省份为多中心省域。与之相对应,外围城市样本为该 18 个省份的地级市。

表 1 区域金融中心样本及其分类

类别	分类明细	
单中心省域	四川省:成都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湖北省:武汉市	云南省:昆明市
	河南省:郑州市	江西省:南昌市
	陕西省:西安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
	湖南省:长沙市	吉林省:长春市
	安徽省:合肥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多中心省域	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
	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	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
	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	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

自银保监会颁布实施《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银监发[2003]2号,银监发[2007]8号修订)以来,为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经营,我国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管理,金融许证实行机构编码终身制。金融许可证详细记载了各家银行分支机构获得牌照的时间和详细通信地址。本文将金融机构与其经营所在地进行匹配,并清理金融机构更名、营业地址变更和金融许可证失控的机构数据,整理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开办信息。由于银保监会于 2006 年放开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的准入限制,选取的样本期间为 2006—2019 年。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万得(Wind)数据库、《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等。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省域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加	单中心	2.773	4.815	0	53
	双中心	6.630	10.414	0	82
解释变量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单中心	22.362	11.644	3.685	53.248
	双中心	23.794	13.400	5.111	73.830
调节变量 城市距离	单中心	2.412	1.955	0.284	22.680
	双中心	24.248	16.399	2.873	71.093

续表

	变 量	省域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单中心	1 557.173	1 714.759	51.928	7 211
		双中心	2 599.759	2 497.794	158.639	20 170
	人口规模	单中心	422.688	240.908	69.000	1 259.000
		双中心	442.582	230.579	92.630	1 275.00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单中心	0.674	0.449	0.056	2.479
		双中心	2.290	2.092	0.164	13.720
	第三产业占比	单中心	36.250	8.190	11.220	72.700
		双中心	40.761	7.130	15.650	61.400
	经济开放度	单中心	8.648	16.688	0.041	249.130
		双中心	37.127	43.908	1.968	349.886
	城市道路密度	单中心	0.102	0.115	0.002	1.224
		双中心	0.342	0.564	0.007	5.790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单中心模型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单中心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会抑制外围地级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增长,即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会对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城市距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围地级市距离金融中心城市越近,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提高对其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抑制效应越强,即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对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假说 H2 得到验证。

表3 单中心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114**(-2.16)	-0.158***(-2.96)	-0.199***(-3.34)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城市距离			0.020*** (2.86)
经济发展水平		0.003*** (3.78)	0.003*** (3.88)
人口规模		0.002** (2.56)	0.002** (2.4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071 (0.95)	1.256 (1.18)
第三产业占比		0.023 (0.71)	0.029 (0.90)
经济开放度		0.016** (2.14)	0.019** (2.45)
城市道路密度		-2.197(-1.55)	-1.564(-1.21)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890	1 890
Adj. R ²	0.173	0.216	0.220

注:括号内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为保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扩大样本量。上文基于《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列出的金融中心进行样本选择,这些金融中心除乌鲁木齐市外均在“十一五”或“十二五”前就提出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目标,而在“十二五”及之后其他省份也陆续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鉴于此,本文根据手动查找的其他省份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时间,将其建设后的样本也纳入单中心模型中重新进行检验。(2)替换被解释变量。上文核心解释变量“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采用“全市各项贷款余额/建成区面积”来衡量,考虑到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明显,银行类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表内业务表外化、金融脱媒等现象(李扬,2017)^[39],改用“全市存款余额/建成区面积”来衡量“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重新进行模型估计。此外,还采用《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提供的“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来替代“全市存款余额/建成区面积”进行稳健性分析。上述检验结果见表4,“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城市距离”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4 单中心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扩大样本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存款密度	金融中心指数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158***(-2.93)	-0.156***(-3.08)	-0.129***(-3.79)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城市距离	0.016*** (3.30)	0.030*** (3.00)	0.017* (1.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29	1 890	1 692
Adj. R ²	0.189	0.213	0.185

2. 双中心模型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双中心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5。“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和“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是否为省会(首府),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都对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具有虹吸效应;“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会弱化另一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研究假说H3得到验证。为保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删除特殊样本。在上文的分析中,对于有3个金融中心的省域(浙江和江苏),以其中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为中心城市,而另一金融中心归为外围城市。对此,采用删除特殊样本(无锡和温州)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单中心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类似,采用同样的方法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3.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通过政策干预引导中心城市的金融资源集聚,其发生和发展对外围城市而言是外生事件,但模型检验仍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重要影响因素,二是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对此,本文借助过度识别检验方法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以减弱因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取工具变量法来缓解逆向因果关系的影响。借鉴Chong等(2013)和张杰等(2017)的研究方法^[40-41],采用与样本中心城市CDI CFCI最为接近的3个外省域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平均金融集聚水

平作为工具变量。选取该工具变量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CDI CFCI 具有较好的客观性、知名度和公信力,指数接近的金融中心之间有激烈的竞争关系,在发展政策和市场关注度上互为参照系,金融集聚水平有较高的相关性。第二,由于不同地区间的存款和贷款等业务活动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割特性(陈松威,2015)^[42],其他省域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选址布局影响不大。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见表7(限于篇幅,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略,备索)。单中心模型中,Kleibergen-Paap Wald 检验的F值大于Stock-Yogo 10%的临界值水平,且通过弱工具变量AR和Wald检验,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双中心模型存在多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有效性指其联合显著程度,故仅进行弱工具变量AR和Wald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城市距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模型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表5 双中心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34***(-2.66)	-0.190*(-1.87)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33***(-3.07)	-0.214**(-2.38)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09*** (3.32)	0.008** (2.53)
经济发展水平		0.001*(1.78)
人口规模		0.003** (2.3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598**(-2.52)
第三产业占比		0.100(1.37)
经济开放度		-0.007(-0.43)
城市道路密度		0.532(0.36)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99	948
Adj. R ²	0.317	0.341

表6 双中心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删除特殊样本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存款密度	CDI CFCI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07**(-2.00)	-0.311**(-2.13)	0.113(0.84)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41***(-2.69)	-0.518***(-3.11)	-0.429**(-2.43)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08*** (2.66)	0.012*** (3.06)	0.003** (2.21)
观测值	920	948	886
Adj. R ²	0.332	0.361	0.326

4. 进一步的研究

(1) 县级市层面的分析

上述采用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县级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城市的经济社会特征,又与农村地区联系紧密,也是逐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

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空间单元。然而,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县域地区的服务功能不足,县域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现象尤为突出(马九杰等,2012)^[43],因而,需要加快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在县级市的合理布局。对此,本文借助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采用县级市层面的数据进一步分析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县级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影响。

表7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单中心模型	单中心调节效应模型	双中心模型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188 **(-2.07)	-0.320 ***(-2.57)	-1.273*(-2.02)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城市距离		0.047 *** (2.76)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93(-1.32)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16 *** (2.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Wald 检验 F 值	129.146	53.674	
Stock-Yogo 10%临界值	16.38	7.03	
AR 检验	4.26 **	7.98 **	20.72 ***
Wald 检验	4.30 **	8.06 **	19.59 ***
观测值	1 077	1 077	576

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以县级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年新增分支机构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县级市的经济规模和多样性小于地级市,在考虑年度和城市固定效应同时,控制变量删除了“城市道路密度”,仅保留“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第三产业占比”。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和银行类经营机构开办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见表8。可以发现,与地级市层面的分析结果一致,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对外围县级市的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不利于中小银行在外围县级市增设分支机构,而区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则会弱化这种虹吸效应和负向影响。

表8 县级市层面的估计结果

变量	单中心模型		双中心模型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11*(-1.83)	-0.019 ***(-2.95)	-0.049 ***(-3.68)	-0.035 **(-2.18)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49 ***(-4.03)	-0.041 ***(-2.86)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01 *** (3.68)	0.001 ** (2.45)
经济发展水平		0.002 *** (4.41)		0.001 ** (2.22)
人口规模		-0.000(-0.57)		0.000(0.0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0.001 **(-2.02)		-0.001(-1.13)
第三产业占比		0.757*(1.78)		2.171 ** (2.11)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707	2 608	2 013	1 852
Adj. R ²	0.073	0.087	0.195	0.201

(2) 对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分析

由于股东性质和服务对象的区别,中小银行存在不同的类型,不同类的中小银行对地方经济信息的处理也有不同优势。因此,进一步分别对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立进行分析。具体来讲,在单中心模型中进行如下分类:一是将中小银行划分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两类,分别进行模型检验;二是按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行法人注册地和地方财政所属股权,对其进行“本省域城商行和外省域城商行”“中心城市城商行和非中心城市城商行”两种划分,选取其中的“本省域城商行”和“非中心城市城商行”两类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在多中心模型中,主要针对城市商业银行,选取“城市商业银行”“本省域城商行”“本省域中心城市城商行”“本省域非中心城市城商行”4类分别进行模型分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样本期间,农村商业银行等涉农中小银行并未获得跨区域经营权,但考虑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中小银行机构,因而在单中心模型中将这一类涉农中小银行作为单独的样本予以考察。上述分类的模型检验结果见表9和表10。结果显示,对于所有类型中小银行,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都对其在外围城市增设分支机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另一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弱化这种负向影响。可见,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广泛存在,进而会促成“中心—外围”的金融非均衡发展空间格局;但是,若在区域内建设多个金融中心,可以弱化单中心的虹吸效应,进而有利于实现金融发展的空间均衡。

表9 对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单中心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股份制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本省域城商行	非中心城市城商行	涉农中小银行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61***(-2.83)	-0.097**(-2.45)	-0.096**(-2.39)	-0.079**(-2.12)	-0.526**(-2.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890	1 890	1 878	1 878	1 878
Adj. R ²	0.233	0.129	0.125	0.072	0.100

表10 对不同类城商行的双中心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城市商业银行	本省域城商行	本省域中心城市城商行	本省域非中心城市城商行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52**(-2.53)	-0.252**(-2.50)	-0.031***(-3.44)	-0.221**(-2.28)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264***(-2.90)	-0.266***(-2.89)	-0.011(-1.47)	-0.255***(-2.94)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0.009***(-2.99)	0.009***(-2.99)	0.001**(-2.42)	0.009***(-2.97)
观测值	948	948	948	948
Adj. R ²	0.255	0.248	0.075	0.230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其中,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对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强。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通过设立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增强金融发展的区位优势成为各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运用拓展的“中心地”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推动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产生虹吸

效应,促进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人才)向中心城市集聚,但这种虹吸效应会随着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当区域中存在多个金融中心时,一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弱化其他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可见,从理论上讲,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将加速地区金融资源流向中心城市的自然集聚过程,有利于区域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但金融发展“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也可能加剧发展的非均衡性。对于外围城市来讲,往往更亲近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且地理邻近的中小金融机构,那么,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实践中,对外围城市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选取12个单中心省域和6个双(多)中心省域,利用银保监会的新设银行分支机构地理位置信息数据,以2006—2019年为样本期间,分析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中小银行在外围城市增设分支机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外围城市与中心距离增大而减弱;在双(多)中心省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竞争)弱化了单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上述影响在地级市层面和县级市层面、对于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均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

本文对省域金融单中心和多中心的比较分析表明,单中心布局使中心城市对金融资源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会形成“中心—外围”的金融资源二元结构空间格局,不利于区域金融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多中心布局能够弱化单中心的虹吸效应,有助于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优化。基于上述结论有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作为空间范围较大的地理单元,省级区域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时,应基于空间范围的大小、金融经济发展的水平等,适时考虑采取多中心模式。目前,多数省份的金融中心建设采取单中心模式,少数采取多中心模式。有条件的省域可建设多个区域金融中心,条件不成熟的省域可建设若干“次区域金融中心”(省域内某片区的金融中心),或建设几个金融发达城市,形成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以弱化中心城市对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在提升区域整体金融效率的同时增进金融发展的空间均衡性。第二,在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外围城市的金融发展,尤其应加强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资源配置。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市对金融资源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同时对周边城市也辅以一定的政策支持,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在鼓励金融机构入驻区域金融中心同时,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实现省域行政区内的市、县全覆盖。以《广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为例,该计划中不仅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进驻“中国—东盟金融城”聚集发展外,也支持广西北部湾银行、柳州银行、桂林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与各地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力争实现县域服务全覆盖。第三,重视市场力量的作用,通过改善外围城市金融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弱化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虽然政策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虹吸效应带来的金融空间结构落差扩大,但不能改变因从业者效用变化导致的金融资源流向(如涉农中小银行的“离乡进城”倾向)。因此,应积极改善外围城市的发展环境,提高从业者的收入和效用水平,减小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从业者的效用差距。

参考文献:

- [1] 洪正,胡勇锋.中国式金融分权[J].经济学(季刊),2017,16(1):545-576.
- [2] 孙国茂,范跃进.金融中心的本质、功能与路径选择[J].管理世界,2013(11):1-13.
- [3] 俞颖,苏慧琨,李勇.区域金融差异演进路径与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7(4):74-93.
- [4] 谢漾,洪正.城市群兴起的金融集聚效应与影响机制[J].当代财经,2022(2):66-78.

- [5] 江艇,孙鲲鹏,聂辉华.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J]. 管理世界,2018,34(3):38-50+77+183.
- [6] KLAGGE B,MARTIN R. Decentralized versus centralized financial systems:Is there a case for local capital marke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4):387-421.
- [7] 陶锋,胡军,李诗田,等. 金融地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 ——兼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经济研究,2017(9):55-71.
- [8] STEIN J C.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5):1891-1921.
- [9] DEGRYSE H,ONGENA S. Distance,lending relationships,and competition[J],Journal of Finance,2005,60(1):231-266.
- [10] 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2005(7):35-44.
- [11] PAPI L,SARNO E,ZAZZARO A. The geographical network of bank organizations:issues and evidence for Italy [C]// MARTIN R,POLLARD J. Forthcoming in Handbook of Geographies of Money and Finance. Elgar Publisher,Cheltenham, 2015:1-56.
- [12]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 [13]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209-251.
- [14] TABUCHI T,THISSE J F.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of central plac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1,69(2):240-252.
- [15] MARTIN R.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M]. John Wiley,1999:236-285.
- [16]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Introducing a concept[J].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2005,11(2):27-43.
- [17] KAREN P Y L,PAN F,SOKOL M,et al. New financial geographies of Asia[J]. Regional Studies,2020,54(2):143-148.
- [18] WÓJCIK D,MACDONALD-KORTH D. 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 financial sectors in the wake of the crisis:Size, structure and spatial concentr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5(5):1033-1054.
- [19] SOKOL M,PATACCINI L. Winners and losers In coronavirus times:Financialisation,financial chains and emerg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J].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eography,2020,111(3):401-415.
- [20] 车欣薇,郜慧,梁小珍,等. 一个金融集聚动因的理论模型[J]. 管理科学学报,2012,15(3):16-29.
- [21] 王如玉,王志高,梁琦,等. 金融集聚与城市层级[J]. 经济研究,2019,54(11):165-179.
- [22] 徐悦,张桥云. 金融资本集聚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基于空间网络的分析视角[J]. 财经科学,2021(5):13-27.
- [23] 倪鹏飞. 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眼光、国际标准与世界经验[J]. 开放导报,2004(2):58-64.
- [24] 胡苏迪. 中国科技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研究——基于科技金融中心指数的构建与测算[J]. 金融与经济,2018(9):76-81.
- [25] 李林,丁艺,刘志华.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 金融研究,2011(5):113-123.
- [26] YEUNG G,HE C,HAO L. Centr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in reform [J]. Applied Geography,2012,32(2):854-867.
- [27] 贺灿飞,刘浩. 银行业改革与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空间布局——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例[J]. 地理研究, 2013,32(1):111-122.
- [28] HE C F,FU R. Foreign banking in China:A study of 279 branch units in 32 cities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8,49(4):457-480.
- [29] HE C F,FU R.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ocational choices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2009,64(6):701-712.
- [30] HE C,YEUNG G. The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J]. Regional Studies, 2011,45(6):733-754.

- [31] 王擎,吴玮,黄娟.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信贷扩张,风险水平及银行绩效[J]. 金融研究,2012(1): 141-153.
- [32] 李广子. 中小银行跨区经营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金融评论,2013,5(1):66-77+125.
- [33] 李梦雨,魏熙晔. 经济下行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10): 39-47.
- [34] 庄希勤,蔡卫星. 当乡村振兴遇上“离乡进城”的银行:银行地理距离重要吗? [J]. 中国农村观察,2021(1):122-143.
- [35] 潘英丽. 论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1):50-57.
- [36] KING R G, 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3): 717-737.
- [37] 张杰. 经济的区域差异与金融成长[J]. 金融与经济, 1994(6): 16-19.
- [38] 姚铮,胡梦婕,叶敏. 社会网络增进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作用机理研究[J]. 管理世界,2013(4):135-149.
- [39] 李扬.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辨[J]. 经济研究,2017(6):4-16.
- [40] CHONG L T T, LU L, ONGENA S. 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lleviate or worsen credit constraints faced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3, 37(9): 3412-3424.
- [41] 张杰,郑文平,新夫. 中国的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和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17(10):118-136.
- [42] 陈松威. 银行利润持续性研究[J]. 商业研究,2015(7):67-72.
- [43] 马九杰,王国达,张剑. 中小金融机构与县域中小企业信贷——从需求端对“小银行优势”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4):4-13.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Comparison between Single-center and Multi-center in Provincial Areas

XU Yue, ZHANG Qiao-yun

(School of Financ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financial center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Researchers mostly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radiation effects of financial center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eldom studies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avoid a duality finance structure by pursu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while enrich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SMB) branches' network in peripheral areas.

In China, most financial centers in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 the single-center mode, while a few adopt the multi-center mode. Taking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layout and the enrichment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n peripheral areas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geographic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newly established bank branches of CBRC to study the path, mechanism, and vari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network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branches in peripheral cities influenced by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center in different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construction model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provincial single-center and multi-center, so as to illustrate the impact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construction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paper first proposes a research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model

of central place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then constructs an empirical model of single-center and multi-center 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level using data on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new bank establishments from 2006 to 2019 after the CBRC liberalized the market access of off-site branch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single-center model, the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has a siphoning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periphera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central city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network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branches in the periphera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 inhibiting effec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dual-center model,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hibit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ipheral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which in turn weakens the siphoning effect of the single center.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dual center, the easier it is to form a common enhanc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network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branches in the periphera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impact between single-center and dual-center layout patterns also exists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inhibitory impact of the siphoning effect of the single cent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rating network of variou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branches in peripheral cities is universal, and the agriculture-related SMBs are even more affecte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ual centers prompt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with local economic information advantages to prefer to set up branches in local markets, an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center, the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its peripheral cities is enhanced more rapidl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inly expands and deepens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by applying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the analysis of financial practitioners' utility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construc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development layo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re studied. Seco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iphoning effect of a single center on financial resources is determin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refectural and county-level cities through empirical tests, eliminating the concern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peripheral areas under the multi-center development layou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between provincial single-center and multi-center,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hoice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construction mode.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adjusting the single-center model to multi-center is more helpful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market, reduce regional financial inhibition,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Key words: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branches; model of central places; siphoning effect;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LC number: F061.5; F832; F129.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3)02-0079-17

(编辑:刘仁芳)